



生命的 奋进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回忆青春岁月，读书心得，
怀念儿时故乡，亲友情怀。

从他们身上，
能够看到生命中
有一股宏大向上的力量。

梁漱溟 熊十力 唐君毅 徐复观 牟宗三

著

牟宗三

熊十力

梁漱溟

徐复观

唐君毅

刘述先

作序

余世存

撰文推荐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

生命的 奋进

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梁漱溟 熊十力 唐君毅
徐复观 牟宗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 梁漱溟等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08-3981-8

I. ①生… II. ①梁… III. ①新儒家—哲学家—生平
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454号

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作 者	梁漱溟 等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5
字 数	143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981-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生命的奋进：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1984年7月由香港《百姓》半月刊杂志社初版；同年10月由时报出版公司出台湾版。原书收录了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位国学大师的文章，然而也有遗憾——正如原序中刘述先先生所言——缺少了新儒家的重要奠基者熊十力先生的作品。为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在熊十力先生的著作中认真选取了相关的三篇文章（附有一篇白话文翻译，经熊十力先生曾孙熊明心女士帮助改定），使得这部书更加丰富与完整。联系文章授权的过程中，五位先生的家属给予了莫大支持，谨此致谢。尤其熊十力儿媳万承厚女士（熊世菩夫人），年近百岁，且在病痛中，仍亲笔写来长信，实在令我们感动。此外，刘述先先生慷慨应允将原序重刊，余世存先生毅然为本版撰写新序，吴兴文先生给予热心指导与帮助，我们也在这一并致谢！

本次出版，以1984年香港初版为底本，重新进行了编校，调整文章顺序，订正了编排错误（《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一篇是唐君毅所作，原版误为牟宗三）。为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保留了原作者注释及原版编者所加的“原编者注”，其余“编者注”为本版编者所加，特此说明。由于作者创作时所处时代与立场的局限，我们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请读者明辨。

目 录

序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 001

原版序（刘述先） / 008

梁漱溟

梁漱溟简介 / 022

我的自学小史 / 024

熊十力

熊十力简介 / 075

与读书周刊 / 078

读 经 / 082

黎涿玄记语 / 086

唐君毅

唐君毅简介 / 101

怀乡记 / 104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 113

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 130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 154

徐复观

徐复观简介 / 177

我的读书生活 / 180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 191

我的母亲 / 201

牟宗三

牟宗三简介 / 217

说“怀乡” / 220

关于“生命”的学问 / 227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

——序《生命的奋进》

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入至今未能修成“正果”。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未必认可。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上至下的中国人和家庭仍多以留学海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

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无论多么理想、得意，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最多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是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这种历史，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对人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如此感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在中国被称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我们由此可知，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

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当然，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

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

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知。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或“文革”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如果我们对其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是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

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一如西哲讨论人有自愿做奴隶的自由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无知之见。不仅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坎陷或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姿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月异；就是个体自身，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文明史的开

花结果也为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由此可见，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而新儒家诸子们反求诸己的努力使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

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

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他们在现代化多难的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公民之首，士是一个共同体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

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而其同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人物，似乎已经真理在握，已经穷尽学问道术。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明白，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里，新儒家诸子才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如何暂且不论，他们的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2015年8月19日写于北京

原版序

刘述先

这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辈的学者，现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陆；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年离开大陆，活跃于港台的学术文化圈，现在只牟先生一人还健在，年约七十岁，唐先生与徐先生则已于近年逝世。

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是有它的理由的。从清末维新、革命的思想浪潮开始，到五四的反传统，以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对于传统反动与否定。但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无是处么？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有识之士，甘冒时代之大不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他们的思想是通过一己的独立思考与实存体证，经历千锤

百炼以后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咀嚼一番罢！

梁先生的《我的自学小史》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维新思想、家庭气氛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中，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少时竟未背读过四书五经。他的起点是功利实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岁便认定“人生唯是苦”而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间曾经一度实行素食。一直到最后才归向儒家思想，于父亲逝世三年之后才结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意印度过分后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满意西方过分前进现实的思想，而认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指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国文化过分早熟，而希望中国能够兼采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能预烛机先，防患于未然，为人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梁先生论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标举出“情”之一字，这是现代西方科学，乃至马列主义所未能照顾到的人生的极重要的一环。甚至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他自己的根本立场。海外对梁先生的人格最钦佩的地方，就在他能够坚决不改素行，这显出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证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还未曾销毁殆尽。

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开展方面有重要的创发。他在中年著《政道与治道》就明白指出，传统儒家外王之道不

足，必须转接上现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开传统朝廷政治的死结。他在最近演讲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说法已不适用于现代；一个读书人若不能了解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哪里够资格去领导农工商。他的思想虽仍肯定在文化的开展上应建立精神的指导原则，但落实下来，却肯定一种文化的多元论，绝对不许与抱残守缺之辈的想法混为一谈。

牟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毕竟在于他对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的疏解，这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关注之所在。《心体与性体》的伟构现在已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经典性的著作。虽然他谦说他所做的乃“辩以示之”的下层工作，不是“圣人怀之”的最高境界。但现代人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下层的工作。在道统之外，还要建立政统、学统，这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传统。

牟先生出身农家，早年致力于逻辑架构式的思辨之学。后来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这才转归圣学的途径。他早年也曾想参加实际的改革，后来才专心一志做文化学术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在古代、宋明之后，在今日把儒学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无体、无理、无力的大问题。

比较起来，唐先生绝早就表现出他之偏向于思辨学术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学院之内，但一样免不了受到时代浪潮冲击